

胡适文集

胡适文集7

欧阳哲生 编

章实斋先生年谱

科学的古史家崔述

戴东原的哲学

齐白石年谱

丁文江的传记

怀人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一九九八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适文集(7)/欧阳哲生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11
ISBN 7-301-03573-X

I. 胡… II. 欧… III. 胡适-文集 IV. C53

书 名: 胡适文集 7

著作责任者: 欧阳哲生 编

责任编辑: 刘 方

标准书号: ISBN 7-301-03573-X/C·133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32

排版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9.875 印张 480 千字

1998 年 11 月第一版 1998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30 元



进入中年的胡适(39岁)。

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
疑。待人要在有疑處
不疑。

胡適



胡适给人写的一幅题词。



1948年6月15日，胡适与出席泰戈尔画展的来宾在北平民纪念馆的合影。前排：徐悲鸿（右五）、季羨林（左一）、朱光潜（左三），二排：冯友兰（右三）、郑天挺（右四），四排：邓广铭（左四）。



1956 年胡适寓美国纽约时摄。

第七册说明

本册收入《章实斋先生年谱》、《科学的古史家崔述》、《戴东原的哲学》、《齐白石年谱》、《丁文江的传记》和《怀人集》六种。

《章实斋先生年谱》1922年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后经姚名达增补,1931年10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再版,列入“国学小丛书”第一种。1968年台北商务印书馆根据姚名达补订本重印。

《科学的古史家崔述》原载1923年4月《国学季刊》第1卷第2期,后经赵淑贞增补,收入顾颉刚编《崔东壁遗书》(1936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现从《崔东壁遗书》中抽出胡适为该书所作的《序》和《科学的古史家崔述》两篇,收入本集。

《戴东原的哲学》原载1925年12月《国学季刊》第2卷第1期,1927年10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附录戴震的《原善》和《孟子字义疏证》。1968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再版,增收附录戴震的《与某书》一、《与段玉裁书》二和毛子水所作的《后记》。鉴于附录部分篇幅过长,本集未收。

《齐白石年谱》为胡适、黎锦熙、邓广铭合著,1949年3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72年12月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影印出版了胡适的《齐白石年谱》自校本。

《丁文江的传记》初以单篇形式在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刊》、《自由中国》等刊发表。1956年11月收入台北中央研究院出版《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刊》。1960年6月台北启明书局缩印再版,附作者《校刊后记》。1973年台北中央研究

2 胡适文集 7

院胡适纪念馆据启明版重印,并增收附录二篇和毛子水的《后记》。

《怀人集》系编者新编,收入胡适为各类人物所写的回忆文章或纪念文章,最早的写于1924年,最晚的写于1961年,凡十五篇。

目录

章实斋先生年谱

何序 何炳松/3

姚序 姚名达/19

胡序 胡适/25

大事索引/29

章实斋先生年谱/31

校后补记 姚名达/123

附录 更正《章实斋年谱》的错误(胡适给姚敬存的一封信)/125

科学的古史家崔述

《崔东壁遗书》序/129

年谱目/136

科学的古史家崔述(1740—1816)/140

一 家世/143

二 崔述的年谱(上)/146

三 崔述的年谱(下)/183

后记/229

补叙 赵贞信/231

戴东原的哲学

- 一 引论/239
- 二 戴东原的哲学/250
- 三 戴学的反响/281

齐白石年谱

- 序一 胡适/346
- 序二 黎锦熙/351
- 齐白石年谱/353
- 跋 邓广铭/395

丁文江的传记

- 引言/401
- 一 家世和幼年生活/402
- 二 他的恩师——龙研仙先生/404
- 三 他在日本一年多——计划往英国留学/406
- 四 海上的救星/408
- 五 在英国留学七年(1904—1911)/410
- 六 第一次中国内地的旅行/414
- 七 地质科科长——地质研究所——北大地质系/417
- 八 民国初年的旅行——太行山与山西铁矿——云南与四川/421
- 九 丁在君与徐霞客/428
- 十 地质调查所所长(1916—1921)/434
- 十一 北票煤矿公司(1921—1925)——《努力周报》(1922—1923)/439
- 十二 《玄学与科学》的论争(1923)(附论他的宗教信仰)/451
- 十三 “大上海”的计划与实施(1926)/472
- 十四 回到地质学来：广西的地质调查(1928)——西南地质调查队(1929—1930)——北大地质学教授(1931—1934)/487

十五 独立评论(1932—1935)/500

十六 苏俄的旅行(1933)——最后三年的政论/510

十七 “就像你永永不会死一样”/531

附录 丁文江遗嘱/546

校勘后记/548

附录一 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暂行章程/551

附录二 龙研仙同情革命 芝翁/554

后记 毛子水/555

怀人集

林琴南先生的白话诗/559

追悼志摩/564

国府主席林森先生/572

追忆曾孟朴先生/575

兴登堡/578

刘半农先生挽辞/585

记辜鸿铭/586

海滨半日谈(纪念田中玉将军)/591

丁在君这个人/596

高梦旦先生小传/605

张伯苓/608

追念熊秉三先生/6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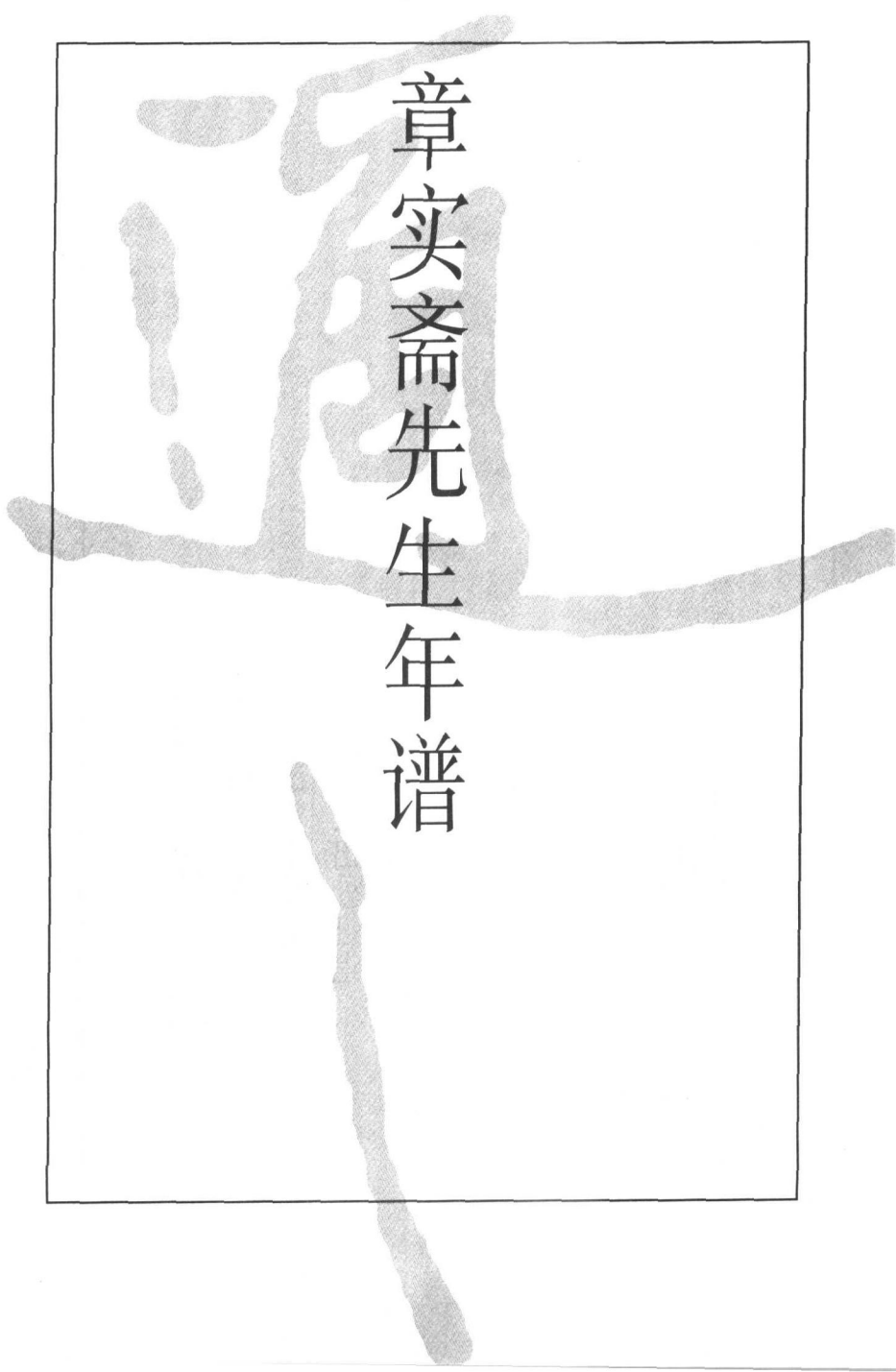
纪念席德懋先生/617

记美国医学教育与大学教育的改造者弗勒斯纳先生
(Abraham Flexner 1866-1959)/618

怀念曾慕韩先生/624

追忆太戈尔在中国/625

章实斋先生年谱



通

年譜之體，仿于宋人；
考次前人撰著，

因而譜其生平時事，
与其人之出處進退，
而知其所以為言，

是亦論世知人之學也。
文集者，一人之史也。

家史，國史，

與一代之史亦將取以証焉。
不可不致慎也。

——韓柳年譜書后

何序

替古人做年谱完全是一种论世知人的工作,表面看去好像不过一种以事系时的功夫,并不很难;仔细一想实在很不容易。我们要替一个学者做一本年谱,尤其如此;因为我们不但对于他的一生境遇和全部著作要有细密考证和心知其意的功夫,而且对于和他有特殊关系的学者亦要有相当的研究。对于他当时一般社会的环境和学术界的空气亦必须要有一种鸟瞰的观察和正确的了解,我们才能估计他的学问的真价值和他在学术史中的真地位。所以做年谱的工作比较单是研究一个人的学说不知道要困难到好几倍。这种困难就是章实斋所说的“中有苦心而不能显”和“中有调剂而人不知”,只有做书的人自己明白。

胡适之先生的《章实斋年谱》就是这样做成功的。我记得当民国十一年二月商务印书馆把这本《年谱》印好寄给他的时候,他曾经有下面这一段日记,我现在替他发表出来,来证明我上面所说的话并不是一种幻想。他的日记上说:

此书是我的一种玩意儿,但这也可见对于一个人作详细研究的不容易。我费了半年的闲空工夫,方才真正了解一个章学诚。作学史真不容易!若我对于人人都要用这样一番工夫,我的哲学史真没有付印的日子了!我现在只希望开山辟地,大刀阔斧的砍去,让后来的能者来做细致的工夫。但用大刀阔斧的人也须要有拿得起绣花针儿的本领。我这本《年谱》虽是一时高兴之作,他却也给了我一点拿绣花针的训练。

适之先生此地所说的甘苦,我们看了谁亦要表同情。不过他说这本《年谱》是他的一种玩意儿,一时高兴之作;我个人却不敢同意。我以为适之先生所说的一种玩意儿,一时高兴之作,正是章实斋所说的:“天下至理,多自从容不迫处得之;矜心欲有所为,往往不如初志。”所以就我个人讲,一面想到做《年谱》这种工作的困难,一面看到适之先生这本《年谱》内容的美备,我实在不能不承认这本书是一本“即景会心妙绪来会”的著作,不是一种“玩物丧志无所用心”的玩意儿。这种工作当然不免有疏漏的地方,但是我们坐享其成的读者却不应过度的去求全责备。

今年秋间王云五先生因为很赏识适之先生这本《年谱》,所以要把他选入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里面去,预备将版式改排。适之先生知道了,就很虚心的趁这个机会托一个对于章氏学说很有研究的人代他增补一下。这位受托的人就是刚从北京清华研究院毕业,南下旅居上海努力读书的姚达人先生。当达人先生进行他那增补工作的时候,他每星期总要到我的家里来交换一次我们对于史学的意见。他因为研究章氏已经三四年了,身边又带有充分的材料,所以能够从九月到十月不满一个月的工夫就完成他的工作。我知道他实在补进了不少的材料,而且有一部分材料是适之先生当时还没有发现出来的;因此这本《年谱》的内容更加美备了。

达人先生增补完工之后,就把这增补本交给适之先生去校正。适之先生看了一遍完全同意;并且向达人先生说:他近来听见我对于章实斋的史学已经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所以要叫我代他们两人再做一篇序表示我近来的心得。当达人先生把这话告诉我的时候,我很是迟疑,但是亦就立刻答应。

章实斋在《文史通义·匡谬》篇中曾经说过:“书之有序所以明作书之旨也,非以为美观也;”这是一句很合理的话。我们应该服膺他。我既然不是做这本《年谱》的人,当然不应该谈这本《年谱》

的“作书之旨”。适之、达人两位先生和我三个人既然多少都是私淑章氏的人，那末适之先生不该发起叫我做这篇序，达人先生不该附和他，我亦不该答应他。这是我所以迟疑的缘故。但是我当时反省了几分钟，终于答应了，而且自己觉得很有理由。

第一我和适之、达人两位先生有一种特殊的交情。我和适之先生的文字交，始于民国二年的夏季。我记得当时他是《留美学生季报》的编辑，我是一个投稿的人。民国四五年间我和他才在纽约常常见面谈天，成了朋友。民国六年以后我在北京大学教了五足年的书，又和适之先生同事，而且常常同玩。他和我不约而同而且不相为谋的研究章实斋，亦就在那个时候。结果他做成一部很精美的《年谱》，我做了一篇极其无聊而且非常肤浅的“管见”。我的翻译《新史学》亦就是在这个时候受了他的怂恿。民国十一年后我到杭州办了两年最无聊的教育，受了两年最不堪的苦痛。可巧这时候适之先生亦就在西湖烟霞洞养他的病；而且据我所知，这次的休养是他平生最长的一期。现在我们两人又不期而然不约而同的同在上海过活了。我以为就十七年来行止上看，我们两人的遇合很有点佛家所说的“因缘”二个字的意味。

至于我和达人先生的交情，比较的时间很短。我们两人开始互通音问，不过三年；两人见面不过数月。但是我看见他这样热心的研究章实斋，他今年夏天为了研究章实斋冒暑到绍兴去，到杭州去；我又看见他这样热心的努力学问，甚至辞去各地学校的聘请，单身自备资斧留居上海，一心向学问上努力。我们看到现在中国学术界的情形和一般社会的风气，对于达人先生这种心胸那能不肃然起敬呢？他在上海的时候，每星期总要到我的家中谈一次话；而章实斋有时就做我们谈话的中心。所以我们定交的时期虽短，交情却已不浅。所以就我和适之、达人两位先生的交情而论，我虽然不敢以“章氏同志”的名义来互相标榜，我对于他们两位研究章